

南安丰州成为六朝时期闽南政治、经济中心的原因

——以六朝古墓葬考古发掘为例

吴艺娟 泉州市博物馆)

摘要: 本文从南安丰州古墓葬大量考古材料考证出发, 结合当地气候、地形等特点, 论证了其成为六朝时候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原因, 从而进一步说明泉州城市的迁移进程。

关键词: 南安丰州; 六朝; 墓葬

中图分类号: K8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2008)03-079-05

一、丰州的历史沿革

百越是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古代民族的统称。《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瓚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是知百越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百越族土著擅长造舟航海,《越绝书》云:“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可见,善使舟船是越人的一大特点。战国时期,越族入泉。公元前306年前后,越与楚作战,越王战败被杀,国亡于楚,今泉州属楚地。越族入闽之后与七闽土著发生融合,并在闽中传播吴越和中原文化,百越中独立一支——闽越族由此形成。当时,泉州与中原尚没有建立有效的行政关系。秦汉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广大地区生活的是百越民族,泉州境内居住着百越之一的闽越族。汉以前的泉州,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仅指出属先秦的百越地区、秦代的闽中郡、汉初的闽越国地,东汉的会稽郡侯官都尉,中原王朝显然对泉州一无所知,未在泉州范围内设置任何行政机构。已知泉州汉以前的文化遗址均分布在晋江两岸和沿海一带^[1],从遗址的性质、包含物特征和年代上看,当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即贝丘遗址,贝丘遗址已明确告诉当时聚居在晋江两岸和沿海地区的先民以捞贝为生,贝类是最重要的食物资源。泉州以捞贝为主的渔猎采集经济延续到汉代。汉初泉地属闽越国,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灭闽越国后,尽迁闽越人安置于江淮地区,公元前85年,闽越故地设立冶县,县治在今福州,辖地范围包括今晋江。吴永安三年

(260年)立建安郡并在今泉州南安丰州设置东安县治,说明东吴已真正治闽了^[2]。建安郡的建立,表明户口的增加,当时有相当多的人来自东吴,控制并经营闽地,由于户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晋太康三年(282年)析建安郡立晋安郡,吴时的东安县改为晋安县(今南安),隶属晋安郡,县治在今丰州镇,南朝梁天监间(502—519年)析晋安郡置南安郡,为全省三郡之一,郡治在今丰州镇,管辖现在莆田、泉州、漳州、厦门四市地^[3]。“丰州者,丰美、丰饶之州也。”作为地名。南朝568年,升晋安郡为丰州,治所设在福州(即今福州地区)。彼时的丰州,实际上相当于省级编制。晋人南迁,他们沿南安江(后改称晋江)而居,晋江由此得名,晋人南迁在晋江下游聚居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丰州镇^[4]。

二、考古发掘说明南安丰州

在六朝时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中心

1949年后泉州境内发现了许多东西晋与南朝的墓葬,墓葬方式与器物风格“与江南地区六朝墓完全相同^[5]。”考古资料证明西晋时期,中原汉人已入居泉州。1982年,在南安丰州庙下村发现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墓,从墓室的结构及出土的器物分析,其墓主人应系为中原南迁的士大夫阶层^[6],在南安丰州狮子山发掘一处较大的两晋南朝墓葬群,1973年8月就发掘东晋墓6座,其中有东晋宁康三年(375年)、太元三年(378年)墓,宁康三年墓出土一颗“部曲将印”和有“陈文绛”字样的砖文,“部曲将印”的出土,说明南下定居晋江流域的陈氏汉人

拥有私人武装部曲^[7]，对研究东晋时期这一地区的阶级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南朝时期，不断有北方汉人南迁到泉州，2003 年在泉州北峰镇招丰村发掘 1 座南朝承圣四年（555 年）墓，出土十几件陶瓷器、纪年墓砖以及僧侣图案的墓砖，其墓葬形制与南京地区发现的南朝贵族墓相同，说明墓主应为迁居泉州的中原汉人^[8]。目前全省共发现南朝墓葬 200 多座，其中纪年墓五六十座，丰州已发现 30 多座。近年来考古发掘，在晋江下游的池店镇浯潭村、池店村、霞福村、新店村等发掘南朝时期的墓葬^[9]，但都比较分散且规模较小。又如 2005 年 10 月在泉州泉港区肖厝（旧属惠安县）一处民宅水沟旁发现了一批西晋永嘉元年（307）的墓砖，都残缺不全。特别注意的是，2006 年 8 月开始，福建省考古队、泉州市考古队对南安丰州皇冠山考古发掘，清理 25 座六朝时期的墓葬群，反映了这

一时期聚族而葬的特点。2007 年 4 月开始，又对南安丰州皇冠山进行考古，发掘出六座纪年墓，出土 30 多件青瓷器物。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选择墓地聚族而葬现象表现最突出的有南安丰州、浦城吕处坞、建瓯、福州等地，南安丰州皇冠山墓葬的清理发掘是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次，除出土大量的陶瓷随葬品外，还有鱼龙、佛像、动物、阮咸等精美图案花纹的墓砖^[10]。丰州地区周围包括泉州、南安、晋江、永春等晋江流域地区，虽都有发现六朝时期的墓葬，但都比较零星分布且保存不完整，尤以南安丰州墓葬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

2007 年 11 月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件未出现堆塑的五联罐（图一），五联罐最早出现于汉代，1956 年福建闽侯出土的一件有堆塑“武士挥剑”的东晋五联罐，据此推断：本墓葬出土的五联罐年代在东晋之前。到目前为止，丰州已发

历年来南安丰州考古发掘六朝时期墓葬表

考古发掘时间	年代	纪年砖	座数	出土器物	其它器物及墓砖纹饰
1957 年 3 月	东晋	咸康元年（335）	1	青蛙小瓷盂、三足瓷、平底小碗、残铁器等 6 件	墓砖纹饰：古钱纹、人面纹
1957 年 3 月	南朝	元嘉四年（427）	18	罐、碗、盘、杯、钵、礁斗、博山炉、插器、碟、虎子等 95 件	墓砖纹饰：古钱、鱼龙、蕉叶、篛纹、人面、佛像、同心圆等
1982 年 1 月	西晋	西晋太康五年（284）	1	陶三足盆、陶谷仓、陶钵、陶甗、陶器盖、陶盘、陶灶、陶釜等 10 多件	墓砖纹饰：四瓣团花、方、圆团花、方圆点纹等
1973 年 8 月（第一批）	东晋	宁康三年（375）、太元三年（378）	3	直口双耳壶、虎子、鸡头壶、罐、钵、砚、碗等 10 多件	篆体阴文“部曲将印”铜印一枚；“陈文绛”字样长条砖。
1973 年 8 月（第二批）	东晋	宁康三年、太元三年	3	壶、虎子、碗等 20 多件鸡首壶、罐、钵、砚	篆体阴文“部曲将印”铜印一枚；“陈文绛”字样长条砖。
2003 年 4 月	南朝	承圣四年（555）	1	盘口壶、瓶、砚、虎子、盂、陶灶等 10 多件	墓砖纹饰：佛像、圆钱四出纹、斜方格纹、菱形纹等
2006 年 8—12 月	南朝	天监十一年（512） 天监四年（505）	2 1	带系罐、托盘、博山炉、盘口壶、盅、钵、砚、虎子、唾壶、插器等 200 多件	墓砖纹饰：佛像、乐器（阮咸）、朱雀、蕉叶、卷草、钱纹、鱼龙、人物等；“陈文绛立之保万年”字样
	东晋	太元三年（378）	1		
	六朝		21		
2007 年 4 月	东晋	太元三年	1	盘口壶、瓶、砚、虎子、盂、陶灶、钵、杯、托盏等 30 多件	金戒指、琥珀项链等
	南朝	天监十一年（512）	3		
2007 年 11 月	东晋	咸安二年（372）	1	鸡首壶、四系罐、杯托、碗、盅、钵、砚等 20 多件	料珠、铜器等；墓砖纹饰：篛梳纹、蕉叶等
	东晋	元兴三年（404）	1		
	东吴至西晋		1	五联罐、双系带流罐、碗、青釉器盖、青釉水盂、青釉盘口壶等 6 件	墓砖纹饰：篛梳与钱纹、直线与半圆弧线纹、弧线、篛梳、叶脉纹、绳纹等

附：南朝承圣四年墓在泉州丰泽北峰镇与丰州镇相邻，历史上隶属南安。



图一 南安丰州流域图

现六朝古墓有明确纪年的、时间最早的是西晋太康五年(公元284)墓,此墓的发现把中原人开发丰州的历史提前了几十年,而且墓葬不仅出土了许多六朝时期的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还有丰富精美纹饰的墓砖。从出土的大量工艺精湛的青瓷实用器和明器,不仅说明当时制瓷手工业的高度成就,而且充分反映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景象;墓葬群的发掘,反映墓主人对社会安定、小康经济生活的祈求;建安郡的建立,表明户口的增加,随着户口的增加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南朝梁时置南安郡,郡治在今丰州镇,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发现六朝时期不同年号的纪年砖,实属罕见,为研究闽南地区早期的开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印证了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充分说明南安丰州在六朝时曾为闽南的政治、经济中心。

三、南安丰州能成为六朝时期 闽南政治、经济中心的原因

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显示,南安丰州成为六朝时期闽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为什么南安丰州能成为六朝时期闽南的政治、经济中心?笔者试浅析其原因。

(一) 六朝时期气候变化

在公元3世纪末期,极端寒冷和干燥的气候降临华中,晋王朝统治期间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在281-290年十年间,一直持续干旱,在309年即晋怀帝永嘉三年达到灾难的顶峰,那时的江河都干枯了,以致人们可以徒步涉过^[11]。在中国北部和中部大面积干旱,饥荒引起了大量饥民

的死亡,西晋王朝被饥荒和暴动削弱,西晋末年,演出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了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出现饥荒,加上战乱不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引起国家分裂,民族大迁徙,当时南方较为安定,中原人士纷纷南下避乱。据清乾隆《福州府志》记载: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12]。朱维干教授引述唐代林蕴的《林氏族谱序》:“汉武帝以闽数反,命迁其民于江淮,久空其地。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13]。”

东晋时期,南北分立,北方汉人更是大批南下,北方汉人相继南迁入闽,不仅为泉州增加了劳动力,而且迁居泉州的中原汉人,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对促进泉州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那么,从东汉末年至南朝,泉州移民带来了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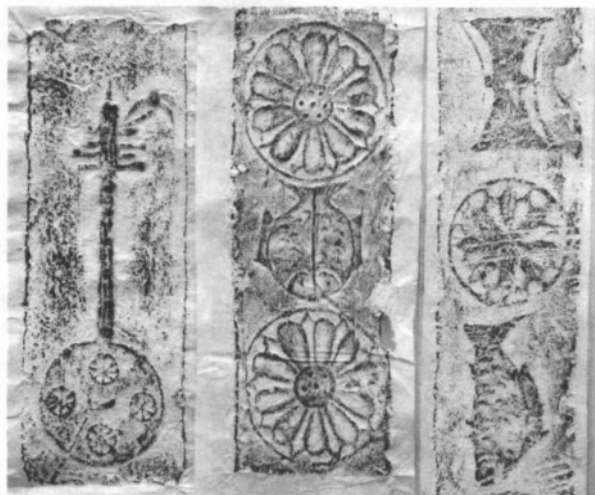
1、农业:水稻种植技术:据史料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22-221年)是小气候最适期,稻谷,这种华南主要作物,当时在山东、河南、河北,这些现在以寒冷和干旱出名的省份种植,由于当时北方大多数冬天温暖无雪,稻谷能在北方生长^[14]。西汉末贝丘遗址的消失和介于汉唐间之移民身份的确定,表明迁居泉州的吴会人民种植水稻的传统带到了泉州,并和原住民一道进行水稻生产^[15]。在西汉闽越国时期,福建地区已出现了众多的铁农具,证明了当时农业技术的高度发展^[16]。福建的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遍布全省的水田,皆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六朝已有了每年两熟或三熟的稻作农业,左思在《吴都赋》中记述孙吴时“国税再熟之稻,说明了当时再熟水稻的生产状况^[17]。

2、手工业:养蚕丝绸技术:泉州气候温和,雨量充足,适合蚕桑业的发展。宋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文帝下诏:“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紵,务尽其方^[18]。”说明蚕桑在南方普遍推广,养蚕丝绸技术必随移民带入福建,到了萧梁时(503—557年)曾任建安太守的到溉咏出了“闽中徒八蚕”的诗句^[19],证明福建每年产蚕八次。

3、青瓷烧造技术：目前已知最早的古瓷窑址是南朝时期的，从朝墓葬中的青瓷随葬品来看，绝大部分应是福建烧造^[20]。地处会稽郡的浙江上虞，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东汉时即开始生产青瓷，东吴和西晋是上虞瓷业蓬勃发展时期，泉州乃至整个福建的青瓷烧造技术无疑是吴会人带来的^[21]。20世纪50年代南安丰州东晋墓（咸康元年335）出土的青蛙小瓷盂和三足瓷盘，釉色深绿透明，说明当时泉州已有规模较大的制瓷工厂。

4、造船技术：《越绝书》卷三记载了古越人所造的船，“越人谓船为须虑，即鹈舟了也。”《正字通》载：“鹈舟了系船小而长者”，这种船外形酷似鸟，头狭尾宽，浆橹在后部推进。《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中记述了泉船的船形、名称均和浙江古越人所造的船是一致的：“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22]。”南朝时南方已能建造载重达二万斛（约合今1000吨）的巨舶，说明当时南方已具备一定的造船规模^[23]。

5、文化：印有南音乐器“阮”的纹饰墓砖的出土。2006年8月开始，对南安丰州皇冠山考古发掘，出土纪年墓砖3种，更为重要的是在出土的墓砖中发现了古代乐器“阮”的印纹（图二），考古发掘出土的4种款式的“阮”纹有3种与在中原古墓葬中出土的同种图案造型极为相似，且在“太元三年”墓砖的背面有一行“陈文绛立之保万年”的字样（图三），陈姓为汉晋时期中原人入闽的八大姓之一。这说明作为我国古代的一



图二

种拨弦乐器“阮”在晋人南迁时，就被一起带到了丰州，进一步印证了晋人南迁带来了中原先进文化艺术的史实^[24]。2007年11月考古发掘出土的五联罐，五联罐流行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说明南迁的中原汉人不仅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厚葬风俗。

6、宗教信仰：延福寺，西晋太康九年（288年）建于南安九日山西二里，是闽南最早的寺院。从墓葬出土大量僧侣图案的墓砖（图四），进一步证实南迁的中原汉人不仅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也带来中原的佛教文化。



图三



图四

大批迁居泉州的中原汉人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影响和改造原住民，并与他们一道共同开发经营泉州，使得这些技术在泉州得到充分发挥；中原文化也迅速地与故地的闽越文化互动融为一体，形成泉州文化的基本模式。

（二）独特的环境特点

以丘陵台地为特征的滨海泉州赤红壤发育，从不同海拔高度的分布形成的土壤垂直分布，在海拔200米以上的坡地多分布红壤或暗红壤，200米以下缺乏水利灌溉的丘陵坡地广泛分布红赤土，红赤土耕层浅、缺水易旱、有机质养分少，这种不利的自然环境其实刚好适合于种桑养

蚕、青瓷烧造和植茶,而晋江两岸的低地和沿海平原为水稻和经济作物种植区,水稻土集中分布在300米以下的丘陵盆地和平原地带,占耕作土壤的85.3%,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安属于亚热带,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这样温暖潮湿的环境很适合于水稻的生长;且晋江和沿海水域又是造船的理想场所,自然环境一方面迫使先民去习于水性,善使舟楫,另一方面又为他们提供了适应环境、征服自然的物质条件。

(三) 与其所处的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南安丰州优越的地理位置

南安市位于福建东南沿海闽南“金三角”中心区域,地处晋江中下游,南安全境山峦起伏,河谷、盆地穿插其间。丘陵山地、水域、平原分别占全市总面积的73%、6.3%和20.7%,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南安丰州位于晋江北岸,距泉州约5公里,为南安县治所在地,处在东溪和西溪的双溪口交汇处,主要河道为东溪和西溪,系晋江上游支流,两溪在丰州溪洲村汇合成金溪,为晋江下游,经泉州湾入海;况且南安县地势北西高,东南低,东南濒临海洋,海拔高度800-1000米,海拔高度递降,形成明显的阶状地形,海洋位置和地形特点使南安气候具有“四序花开常见雨,一冬无雪闻雷声”的特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常年适宜的气候条件,为人类的生活居住提供了优越的天然地理环境,适合人类的居住。

综上所述,首先,六朝时期特定的环境气候,中原大面积气候变冷和干旱,导致农业减产,百姓闹饥荒,加上战事连年不断,国家分裂,东南一隅的福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成为中原人民的向往之地,中原人士纷纷南下,在西晋永嘉末,迅速形成高潮。闽南的晋江流域,“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中原人民的入闽,不仅增加了劳动力,并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从此,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先进的文化也融入到生活中,南北文化不断沟通和融合,与本地的泉州人民共同开发泉州,随着户口的增加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南朝梁时置南安郡,郡治在今丰州镇;其次,南安丰州优越的地理环境,处在东西两溪的交汇处,适宜人类的居住,南迁的中原汉人与原住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

生息,死后选择墓地聚族而葬,反映他们安居乐业的理念。丰州周围再没有发掘出六朝以后的墓葬群,似乎“断代”了,这就足以说明泉州城市的迁移进程,在六朝以后,丰州就不再作为泉州的政治、经济的中心了。

注释:

[1] 蔡保全:《从贝丘遗址看福建沿海先民的居住环境与资源开发》,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

[2][13] 朱维干:《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

[3] 南安县志 卷1《建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4] 清乾隆《泉州府志》。

[5] 黄展岳:《泉州以前的历史考古问题》,《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6] 林宗鸿、郑焕章、黄天柱:《南安丰州西晋太康五年墓》,《泉州文史》第10期,1982年12月。

[7] 泉州市文管会:《南安丰州狮子山东晋古墓 第一批》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1977年)。

[8] 泉州市文物研究中心:《泉州北峰南朝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2005年第2期。

[9] 何振良:《略谈晋江出土的南朝隋唐青瓷器》,《学术泉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

[10] 温松全:《南安丰州皇冠山墓群的发掘与收获》,《福建文博》2007年第3期。

[11][14] 许靖华《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中国科学》(D辑)1998年8日第4期。

[12] 清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1。

[15][21] 蔡保全:《地理、移民:泉州南朝以前经济形态特征》,《农业考古》2001年1期。

[16] 转引徐晓望:《福建通史》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17] 徐晓望:《福建通史》第1卷,第22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18] 《宋书》卷5,《文帝纪》第1641页。

[19] 《南史》卷25,《刘涓子传》第2744页。

[20] 曾凡:《关于福建六朝墓的一些问题》,载《考古》1994年第5期。

[22] 《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十四·泉州风俗,(清光绪八年刊本,金陵书局)。

[23] 简修炜:《六朝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24] 陈建中:《泉州南安丰州六朝墓群出土“阮”纹砖及其学术意义初探》,载《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